

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薛村¹,陆江源²,张铭慎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利用增加值分解方法,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2018年)为主,综合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WIOD)、亚洲发展银行(ADB)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WIOD历史投入产出数据(1965—2000年),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进一步研究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1965—2020年,中国GDP国内循环比例经历了U型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95%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72%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85%。二是1996—2001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1.4%和18.6%,2002—2008年,两者变化为69.6%和30.4%,2010—2018年进一步变化为88.0%和12.0%。近年来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使得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明显优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等国内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国内国际循环;新发展格局;增长贡献;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23)02-0001-13

一、引言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着眼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谋划。已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格局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环境、发展条件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又影响和塑造着国家发展的总体态势(韩文秀,2021)^[1],新发展格局是“力促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黄群慧,2021)^[2],可概括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江小涓、孟丽君,2021)^[3],本质上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陈雨露,2020)^[4],反映出中国开始从战略和发展格局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进行再思考(余永定,2021)^[5]。这充分说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上重塑国内国际循环关系。

重塑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必须以客观描述两者关系的历史演进、基本现状为根本前提,这对掌握国内国际循环关系的演化规律、重塑“锚定”关系的科学方向和合理目标、找到由“此岸”达“彼

收稿日期:2022-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消费与人力资本关联机制及其对创新效率影响研究”(20CJL032);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2021年重点课题“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历史轨迹、国际经验和相关政策研究”(A2021011001)

作者简介:薛村(1994-),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投入产出一般均衡与区域经济;陆江源(1991-),浙江绍兴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双循环、投入产出分析;张铭慎(1985-),湖北武汉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企业创新。

岸”的实现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两者关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分析视角多样,涉及循环比例、循环层次、循环稳健性、循环控制力等诸多内容(张铭慎等,2022)^[6]。大体来看,至少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从结构性看,重点看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这是分析两者关系的重要基础。二是从动力性看,侧重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为深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提供增量和动态视角。三是从层次性看,聚焦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提升循环层次中的功能,这是优化两者关系的重点。四是从主导性看,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稳健性和控制力,这是重塑两者关系的目标。目前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结构性层面,主要是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利用国际投入产出分析工具从国内与国际循环在经济中的占比揭示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黄群慧、倪红福,2021;陈昌兵,2021;杨盼盼、崔晓敏,2021;陆江源,2020)^[7~10],这为更客观地认识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深化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结构比例是多种环境因素、经济条件和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者关系的分析,结构比例就难以满足需要。因此,从结构性层面向其他层面拓展,从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和边际贡献,这有利于将循环与经济增长予以充分联系,提供一个基于循环的动态分析视角,克服目前静态分析国内国际循环在当年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局限。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国际循环在不同阶段牵引大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仅从结构比例的静态视角看难以得到充分洞察。一方面,从全球增长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带来的庞大贸易增量为全球经济注入了强大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从大国增长看,不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还是日本应对日美摩擦带来的创新立国,都表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循环关系出现的边际改变会对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甚至超出循环关系的存量结构。当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加快从工业化后期迈向后工业化阶段,极有可能面临后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问题,从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更好发掘经济增长动力。

二、文献综述

对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的客观定量描述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和国际循环的静态比例关系,对国内和国际循环的动力结构,即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研究偏少,这也为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

近年来学术界定量研究国内国际循环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且主要集中于内外循环比例关系的静态对比。一是从总量贸易角度度量外循环。如江小涓、孟丽君(2021)^[3]利用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从中间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四个方面定义并测度了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循环地位。但随着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不断深化,大规模的中间品贸易使得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很难对双循环进行准确的测度。二是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分解角度研究内外循环比例结构。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增加值分解方法,为国内国际循环比例测算奠定了理论方法基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Johnson和Noguera(2012)^[11]、Koopman等(2014)^[12]、Wang等(2013,2017)^{[13][14]}、倪红福等(2016)^[15]的研究。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对增加值进行分解,区分并测度国内和国际循环,陆江源(2020)^[10]较早地利用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对1995—2015年GDP国内和国际循环进行了分解。黄群慧、倪红福(2021)^[7]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循环将GDP分解为四项,即国内最终品生产的国内简单循环的直接增加、国内最终品生产的国内复杂循环的间接增加、国际最终品生产的简单国际循环的增加值和国际最终品生产的国际复杂循环的增加值,并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进行了实证测算分析和跨国比较研究。陈昌兵(2021)^[8]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测算进口和出口对中国GDP的

贡献率。陆江源等(2022)^[16]进一步利用最新的 ADB 投入产出表数据,分解了中国 2008—2020 年国内国际循环比例,并分析了 2020 年疫情冲击对内外循环的结构性影响。总的来看,静态地分解国内国际循环对 GDP 的某一年的贡献,研究已较为丰富和成熟。

但内外循环比例关系的静态研究在学术和政策实践层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内外循环的高低因国家自身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而异,对循环应该处于何种水平、发挥多大作用缺乏客观的科学标准,很难在学术层面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考察“双循环”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有助于打通“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这两个不同分析维度之间的联系渠道,提供一个基于循环分解的动态分析视角,克服静态分析内外循环比例的局限。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Solow(1957)^[17]较早地从供给端的要素投入角度考察了经济增长。之后有许多研究对索洛的方法做了改进,使用增长核算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代表性文献有张军、施少华(2003)^[18]、郭庆旺、贾俊雪(2005)^[19]、王小鲁等(2009)^[20]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5)^{[21][22]}等。陆江源等(2018)^[23]则从供给端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但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仅从供给端对增长进行核算已无法满足经济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无法区分和比较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总体而言,现有对于国内国际循环测算和增长核算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现有的文献多是分解测算单一年份 GDP 中的内外循环比例,很少有文献基于增长视角深入分析内外循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寻找内外循环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行业。第二,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来源分解不够。现有研究多数是从长期增长框架出发,估算潜在经济增长。这种分析对于需求不足和短期分析情形略显不足。第三,现有文献在测度和分析双循环时,更多地是从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考察各类经济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从长期的动态视角考察双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探讨双循环的国际经验。一些研究采用 2 版本的 WIOD(全球投入产出表),该数据的样本期 2000—2014 年,无法充分分析 2012 年来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现状。

陆江源等(2022)^[16]在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分解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双循环”的测度方法,并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结果更加客观、充分地评价了国内国际循环的不同支撑作用。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将“双循环”与经济增长予以充分联系,并测度内循环、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考察国际经验;第二,不同于供给端要素投入的增长核算,本文集中考察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创造过程,在分解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国内和国际不同需求的长期拉动作用;第三,使用更长时期和更多国际权威机构^①发布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内外经济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版本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检验测算结果稳健性的同时,也使内外循环测度的分阶段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国内国际循环比例的测算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来源分解和增加值贸易核算的文献较多,如 Koopman 等(2014)^[12],王直等(2015)^[24]和倪红福等(2016)^[15]的研究。本文以王直等(2015)^[24]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为基础,进一步完善陆江源(2020)^[10]对一国增加值(GDP)的分解方法。为了直观地理解 GDP 分解模型,本文将多国、多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合并成两国、单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见表 1)。

表 1 中,元素 M_{HH} 、 M_{HF} 、 M_{FH} 、 M_{FF} 是中间产品贸易流矩阵,其中 M_{HH} 表示本国使用本国的中间产品, M_{HF} 表示外国向本国出口的中间产品, M_{FH} 表示本国向外国出口的中间产品, M_{FF} 表示外国使用外

^①包括 2021 年版亚洲发展银行(ADB)国家间投入产出表、OECD 2021 年的跨国投入产出表(ICIO)、2016 年版的 WIOD 数据以及 2021 年版的时间跨度更长的 WIOD 数据。

国的中间产品。元素 Y_{HH} 、 Y_{HF} 、 Y_{FH} 、 Y_{FF} 代表最终产品需求,其中 Y_{HH} 表示本国使用本国的最终产品, Y_{HF} 表示外国向本国出口的最终产品, Y_{FH} 表示本国向外国出口的最终产品, Y_{FF} 表示外国使用外国的最终产品。元素 Q_H 、 Q_F 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部门总产出; VA_H 是本国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本国和外国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VA_F 是外国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本国和外国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表1 归并后的两国投入产出表

	国家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总产出
		本国(H)	外国(F)	本国(H)	外国(F)	
中间投入	本国(H)	M_{HH}	M_{FH}	Y_{HH}	Y_{FH}	Q_H
	外国(F)	M_{HF}	M_{FF}	Y_{HF}	Y_{FF}	Q_F
增加值		VA_H	VA_F			
总投入		Q_H'	Q_F'			

投入产出关系中,总投入转化为了中间品产出和最终需求,投入产出表中的总产出平衡方程可表示为:

$$Q = M + Y = AQ + Y \tag{1}$$

其中, Q 表示总产出, Y 表示最终产品需求, A 表示直接消耗矩阵。中间品贸易流 $M = AQ$, 对式(1) 移项可得:

$$Q = (I - A)^{-1}Y = BY \tag{2}$$

其中, $B = (I - A)^{-1}$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价值。增加值除以总产出得到增加值系数矩阵^①,然后左乘以式(2) 可以得到本国增加值。

(V_H) 的分解:

$$V_H = \hat{V}_H Q = \hat{V}_H BY \tag{3}$$

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中,最终需求可以分解为4个主要部分,分别为 Y_{HH} 、 Y_{FH} 、 Y_{HF} 和 Y_{FF} 。因此,从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创造的角度,增加值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V_H = \underbrace{\hat{V}_H BY_{HH}}_{V_{HH}} + \underbrace{\hat{V}_H BY_{FH}}_{V_{FH}} + \underbrace{\hat{V}_H BY_{HF}}_{V_{HF}} + \underbrace{\hat{V}_H BY_{FF}}_{V_{FF}}$$

其中, $Y = Y_{HH} + Y_{FH} + Y_{HF} + Y_{FF}$ 。 Y_{HH} 对应的 V_{HH} 内涵很明确,就是满足国内需求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Y_{FH} 对应的 V_{FH} 也较为明确,即满足外国需求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属于国际循环。 Y_{HF} 表示进口外国最终品用于满足本国需求,但同样可以分解出本国增加值 V_{HF} ,这部分就是本国中间品投入到外国最终品并最终进口到本国的增加值,属于复杂的国际循环。同样 Y_{FF} 对应的 V_{FF} 就是本国中间品投入到外国最终品并满足外国需求的增加值,也属于复杂国际循环。由此, V_{FH} 、 V_{HF} 、 V_{FF} 都属于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但 V_{HH} 仍有待进一步分解。

A_H 是本国内循环中间投入系数的对角分块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出时需要来自本国中间品的价值,进一步得到只包含本国投入产出关系的修正间接消耗系数矩阵 B_H ,从而将公式进一步修正为:

$$\tilde{V}_{HH} = \hat{V}_H (1 - A_H)^{-1} Y_{HH} = \hat{V}_H B_H Y_{HH}$$

\tilde{V}_{HH} 是只通过本国投入产出关系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可以理解为纯国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部分。 $V_{HH} - \tilde{V}_{HH}$ 、 V_{FH} 、 V_{HF} 、 V_{FF} 的总和就是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部分。特别地,还可以进一步将 Y_{HH} 分解为纯国内消费 C 和纯国内投资 I ,从而分解出不同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① Λ 表示增加值系数矩阵。

(二) 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解方法

第一步,在对国内和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的基础上,将各增加值通过各年平均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计价。由于国际投入产出均以现价美元计算,如果以美元计价计算各年增加值增长,将会因每年汇率的变动而产生较大的误差,比如某年本国增加值增长 10%,汇率也增长了 10%,那么以美元计价的增加值就增长了 20%,同时国内循环没有增长,国际循环的增长贡献就会被过高估计。

第二步,将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增加值除以各年 GDP 平减指数得到不变价增加值,进行年份差值得到增量,从而得到国内和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步,进一步分解得到各行业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 数据来源说明

目前应用较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主要包括 2014 年版的 WIOD(时间跨度为 1995—2011 年),2016 年版的 WIOD(2000—2014 年),OECD 的 2021 年版(1995—2018 年),ADB 的 2021 年版(2000,2007—2020 年)。特别地,WIOD 在 2021 年发布了包括 23 个经济体、24 个行业的历史国际投入产出表,时间跨度为 1965—2000 年。

本文在计算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比例时,对上述各类国际投入产出表都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比较。在计算增长贡献时,考虑到 OECD 的 2021 年表格时间跨度较长,具有 66 个经济体和 45 个行业分类,因此主要采用该表格进行测算,同时利用 WIOD 和 ADB 数据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检验。

四、国内国际循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

(一) 国内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的比例结构

各类数据库的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国内国际循环的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通过利用 WIOD 历史数据、2014 年和 2016 年版的 WIOD 数据、OECD 版本和 ADB 版本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得到中国 1965—2020 增加值国内循环比例,为了更好地观察不同的数据库的异同,本文将数据结果放在同一图中展示(见图 1)。WIOD 数据和 ADB 数据的测算结果具有较好的重合度,在数据重合年份(2007—2014 年)两条线几乎重叠。OECD 的测算结果普遍比其他两个数据库的测算结果高出 2%,这主要是由于 OECD 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中国投入产出划分为加工贸易部分和非加工贸易部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关系更为简单。而 WIOD 和 ADB 数据并未做此类划分,加工贸易也通过全部投入产出关系产生最终品,这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可能存在高估,由此造成了 OECD 与其他数据库测算的差异。总体来看,各类数据库的测算结果都印证了国内循环比例 U 型变化的趋势,在 2009 年等特殊年份也呈现了数据的突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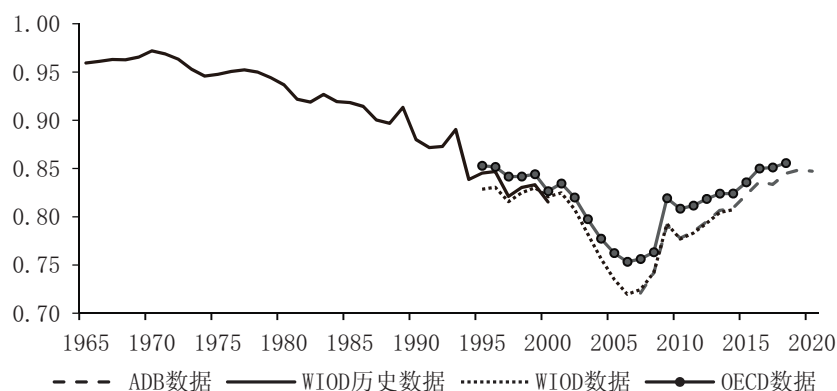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GDP 国内循环比例(1965—2020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国内国际循环比例变化体现了内外循环关系的演进。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内循环比例高达

95%至97%。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循环比例从1978年的95%下降至2001年的83%,加入WTO后国际循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内循环比例进一步下降至2006年的低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国内循环比例迅速攀升,之后稳步提高,至2020年提升至85%左右。

近年来中国GDP国内循环比例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强。将各国GDP中国内循环的部分剔除,可以计算得到各国加总的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规模,根据OECD数据,1995年到2018年,中国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占全球国际循环增加值的比例从2.25%大幅攀升至11.54%,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循环扩张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仍在不断提升。

(二)国内国际循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占比,只能衡量内外循环的静态比例关系。目前的经济增长核算主要从供给端计算,仅从供给端计算经济增长已不能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而需求端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无法充分衡量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忽略了消费和投资中的进口填补和出口拉动作用,净出口抵消了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仅考虑净出口容易极大低估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依靠增加值分解的方法,根据最终需求的结构视角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和测度,有效弥补了传统三驾马车测算方法的局限性。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支撑的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分解,也能更好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通过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1996—2018年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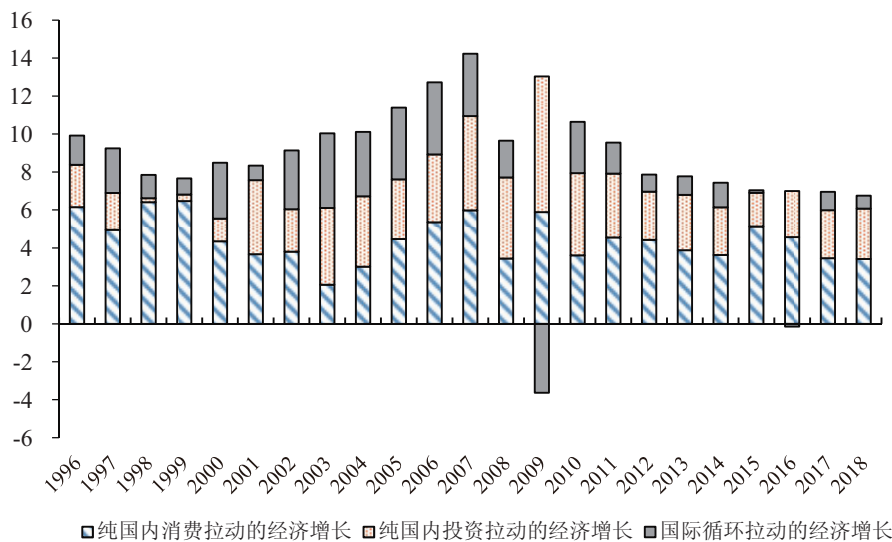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1996—2018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总的来看,1996—2018年纯国内循环年均拉动经济增长7.11个百分点,其中纯国内消费拉动4.27个百分点,纯国内投资拉动2.84个百分点,国际循环年均拉动1.58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为稳定,方差仅为1.97,纯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差为2.26,国际循环的稳定性较差,方差为2.73。

分阶段来看,1996—2001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年均均为6.97个百分点,国内循环拉动增长贡献率年均均为81.4%,国际循环拉动1.62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增长贡献率年均均为18.6%。加入WTO以后,2002—2008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7.72个百分点,对增长拉动的贡献率年均均为69.6%,国际循环年均拉动增长3.32个百分点,拉动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0.4%。外生冲击之下,内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气所在、韧性所在,2009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高达13.04个百分点,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3.64个百分点。2010—2018年,国际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拉动效应呈现整体下降态势,年均拉动经济增长 1.08 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年均仅为 12.0%,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 6.85 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为 88.0%。

为了检验测算结果的稳健性,利用 2016 年版的 WIOD 数据和 ADB 的 2007—2020 年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同样对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测算(见图 3)。结果发现,ADB 数据和 2016 年版的 WIOD 数据具有较强的重合度,与 OECD 数据在多数年份的重合度较强,在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利用 WIOD 数据测算的国际循环拉动的经济增长要比 OECD 数据分别高出 0.5、0.8 和 0.9 个百分点。使用不同数据进行测算必然存在结果上的差异,前面指出 WIOD 数据可能对加工贸易的增加值存在高估,因而在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 2006 年前后,对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评估值较高。整体来看,不同数据库测算的 2007 年以后的国内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基本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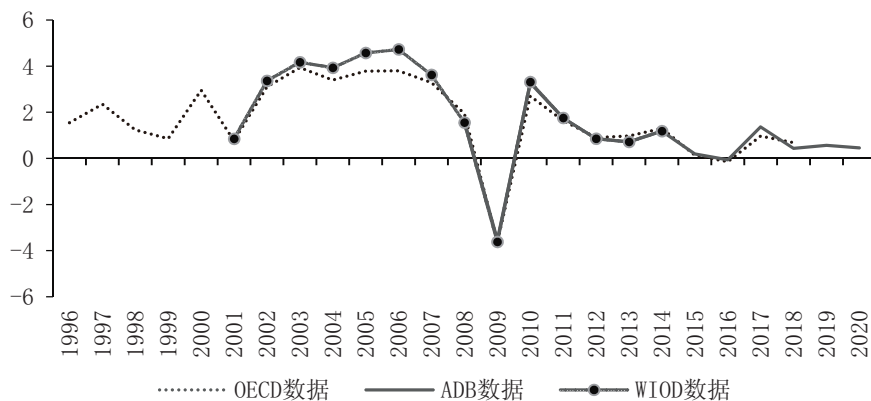


图 3 依托不同数据库计算的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类型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将 OECD 国际投入产出表的 45 个行业按照行业特性归并成了 16 个大类行业(见表 2)。不同于供给端的行业分类,本文对行业的分类主要考虑行业最终需求特性,即该行业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的水平。这 16 个大类行业基本可以分成以下部分:一是物质消耗类,包括农业和食品类、纺织服装轻工类、重化工产品类、电子产品类、电气机械设备类、交通运输设备类;二是传统服务类,包括水电燃气类、批发零售类、交通运输类、住宿餐饮类;三是建筑房地产类;四是技能服务业类,包括信息技术服类、金融类、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和其他服务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参考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22]的方法,包括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服务。

上述研究表明,2001 年加入 WTO 前、加入 WTO 到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危机后三个阶段的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同的拉动效应。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这三个阶段国内和国际不同需求类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甄别拉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扩张的主导需求产业类别。

1996—2018 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国内循环牵引主导—国际循环主导—再到国内循环主导的 U 型变化,一些行业的国内需求也经历了 U 型变化,但另一些行业的增长贡献却不断下降,另一些行业显著上升,愈发表现出后工业化国家的特性。近二十多年来国内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物质消耗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国内农业食品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11.11% 下降至 7.82%,重化工产品类从 12.30% 下降至 10.81%,电气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类分别从 3.44% 和 2.77% 下降至 2.19% 和 1.70%。尽管电子产品类和纺织服装轻工类经历了 U 型变化,但金融危机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不及 2001 年前的水平。二是各类技能服务需求成为国内大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 7.83% 大幅提升至

13.52%,金融类、信息技术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三是经济增长对建筑房地产类的依赖性显著强化,建筑房地产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9.69%大幅提升至15.06%,而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该比例更是高达28.16%。四是传统服务业的增长贡献迥异,批发零售类对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这与近年来电商经济、外卖经济等兴起、商贸物流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深化有关,金融危机后国内批发零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高达8.64%,同时交通运输类、住宿餐饮类等传统服务业的增长贡献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2 不同国内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1996—2001年	2002—2008年	2009年	2010—2018年
农业和食品类	11.110	9.850	12.440	7.820
纺织服装轻工类	2.510	1.680	6.080	1.810
重化工产品类	12.300	11.220	15.990	10.810
电子产品类	1.270	0.480	4.450	0.870
电气机械设备类	3.440	3.410	8.040	2.190
交通运输设备类	2.770	1.890	3.720	1.700
水电燃气类	3.380	2.250	3.400	2.690
批发零售类	6.840	4.890	13.400	8.640
交通运输类	6.270	2.490	5.160	3.420
住宿餐饮类	2.320	1.880	1.830	1.610
信息技术服务类	2.270	2.020	2.390	2.990
建筑房地产类	9.690	10.820	28.160	15.060
金融类	3.470	4.080	12.770	8.070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7.830	6.890	13.780	13.520
公共管理类	4.290	4.430	4.980	5.030
其他服务类	1.610	1.330	2.110	1.780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由此可见,在中国国内大循环作用不断增强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需的主导产业类别是以教育、医疗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服务和建筑房地产业,同时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将批发零售类和信息技术服务类塑造成内需扩张的重要产业。

从国际需求的角度看,2002—2008年和2010—2018年两个阶段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明显差异,不同行业国际最终需求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见表3)。在国际大循环的增长拉动效应不断加强的2002—2008年,物质消耗类国际需求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产品类、纺织服装类、电子产品类、电气机械设备类、批发零售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均在2%以上。而在国内大循环增长作用强化的2010—2018年,物质消耗类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迅速回落,上述各类外向型程度较高的行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出现较大程度的降幅。同时,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较为明显,信息技术服务类的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从0.59%变为0.50%,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从1.12%变为0.93%,与整体国际循环的增长带动作用相比降幅较小。

表3 不同国际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1996—2001年	2002—2008年	2009年	2010—2018年
农业和食品类	1.570	2.640	-3.400	0.840
纺织服装类	2.320	2.910	-2.210	0.320
重化工产品类	3.790	8.050	-13.830	2.620
电子产品类	2.500	2.680	-2.240	0.740
电气和机械设备类	1.850	2.570	-3.070	1.230
交通运输设备类	0.510	0.790	-1.200	0.180
批发零售类	2.250	3.230	-3.290	1.990
交通运输类	1.390	2.430	-4.010	0.700
水电燃气类	0.760	0.940	-1.360	0.380
住宿餐饮类	0.300	0.430	-0.480	0.090
信息技术服务类	0.350	0.590	-1.100	0.500
建筑房地产类	0.190	0.340	-0.910	0.280
金融类	0.430	1.370	-0.830	0.890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0.520	1.120	-0.980	0.930
公共管理类	-0.020	0.010	-0.010	0.020
其他服务类	0.100	0.200	0.130	0.040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五、后工业化国家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可以实现大国内部可循环。对于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而言,无论处于任何发展阶段,国际市场都具有足够牵引其经济增长的国际需求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现价美元数据,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占世界经济比重一度高达30%至40%,之后不断下降但在2020年仍占24.7%,日本占世界经济比重在1994年一度高达17.9%,中国在2020年占世界经济比重也达到了17.4%,相对于庞大经济体量所需的经济增长规模,尤其是对于经济占比不断扩张的崛起大国而言,国际循环能够支撑的经济增长是十分有限的,长足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国内循环带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经济大国如何依靠内外循环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方面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就后工业化大国而言,只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具有借鉴性,因为一些体量较小、但发展阶段较高的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循环带动。

(一)后工业化大国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分解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已较为成熟和定型,考察这些经济体在1996—2018年的经济增长绩效发现(见图4),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好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与其国内循环强大的牵引作用是分不开的。1996—2018年期间,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的拉动为2.29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0.18个百分点,英国和法国国内循环年均拉动增长1.71和1.21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0.40和0.43个百分点,德国和日本更多地依靠国际循环,德国依靠国内和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0.68和0.75个百分点,日本则分别为0.11和0.68个百分点。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长期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循环拉动,而且其国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水平甚至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国内与国际循环拉动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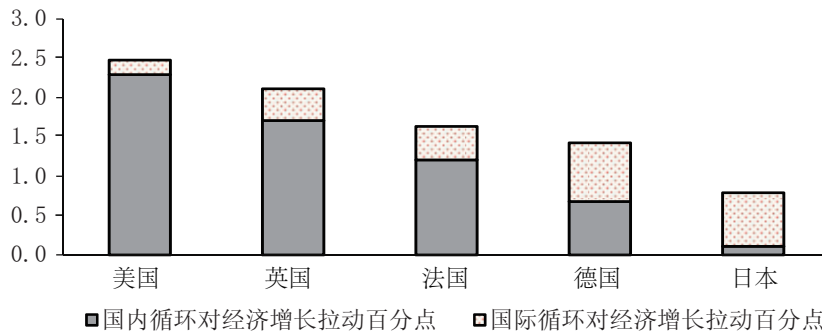


图4 主要后工业化大国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百分点(1996—2018年)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分阶段来看,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各国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见表4)。美国表现为国内循环拉动效应减弱,即从危机前的2.77个百分点下降至金融危机后的1.97个百分点。英国、法国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在国际循环牵引作用并未较大减弱的情况下,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均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际循环牵引较强的国家则出现了反向变化,德国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从金融危机前的0.48个百分点提高至金融危机后的1.06个百分点,日本则从-0.13个百分点提高至0.66个百分点,同时这两个国家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均出现了下降。

从上述样本的时间范围来看,后工业化国家中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的国家比更多依靠国际循环的国家具有更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表现。但在后危机时代,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不断下降,外向型国家在国际循环牵引效应减弱的情况下也开始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由此这些经济体都出现了一种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趋同的收敛现象。

表4 主要后工业大国金融危机前后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百分点

单位:%

国别	金融危机前(1996—2008年)		金融危机后(2010—2018年)	
	国内循环拉动	国际循环拉动	国内循环拉动	国际循环拉动
美国	2.770	0.260	1.970	0.270
英国	2.200	0.420	1.500	0.570
法国	1.570	0.590	0.840	0.540
德国	0.480	1.050	1.060	1.010
日本	-0.130	1.010	0.660	0.730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二)后工业化大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类别分析

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由于拥有较强的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因而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表现要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笔者进一步通过对45个行业进行归并分类,分析16大类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由于行业划分较细、行业带动作用较小的原因,故采用经济增长千分点的形式,见表5。

几乎美国的所有行业的国内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强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真正能拉开增长差距的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建筑房地产类和金融类。在农业食品类、重化工产品类、电子产品类、电气机械设备类、交通运输设备类等物质消耗部门,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要明显高

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但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后工业化时代,物质消耗型需求比重大幅下降。同时,这些国家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最明显的类别都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美国年均拉动 6.41 个百分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也分别拉动 6.04、4.56、2.83 和 3.58 个百分点,美国与德国在这个行业的差距也高达 3.58 个百分点,成为从需求端考量美国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优于德国的主要因素。此外,美国建筑房地产类、金融类和信息技术服务类的国内循环也明显强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英国、法国在这些行业的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也要强于德国和日本。

表 5 主要国家国内循环年均拉动经济增长的千分点(1996—2018 年)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农业和食品类	0.460	0.180	0.180	0.140	-0.520
纺织服装类	-0.010	0.060	-0.110	-0.040	-0.540
重化工产品类	0.590	-0.200	0.000	-0.110	-0.050
电子产品类	0.290	0.130	-0.080	-0.070	-0.170
电气和机械设备类	0.210	0.200	0.060	0.150	0.100
交通运输设备类	0.220	0.090	0.010	0.050	-0.170
批发零售类	2.130	2.070	0.680	0.370	-1.460
交通运输类	0.610	0.680	0.400	0.120	0.250
水电燃气类	0.350	0.670	0.250	0.200	-0.260
住宿餐饮类	0.740	0.600	0.420	0.210	-0.470
信息技术服务类	1.670	1.140	0.800	0.820	0.750
建筑房地产类	4.250	2.660	2.970	1.580	0.630
金融类	2.580	1.190	0.500	-0.200	-0.630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6.410	6.040	4.560	2.830	3.580
公共管理类	2.050	1.000	1.200	0.610	0.140
其他服务类	0.400	0.610	0.230	0.140	-0.060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增加值分解的方法,结合 OECD、ADB、WIOD 和 WIOD 历史数据等数据库,在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比例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测算,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在结构上经历了 U 型变化。中国 GDP 国内循环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 95% 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 72% 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 85%。同时,中国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占全球国际循环的比重也从 2.25% 大幅攀升至 11.54%,甚至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循环扩张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仍在不断提升。

二是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在动力上也经历了 U 型变化。利用 OECD 数据测算发现,1996—2001 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为 81.4% 和 18.6%,2002—2008 年,两者变化为 69.6% 和 30.4%,2010—2018 年进一步变化为 88.0% 和 12.0%。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为稳定,其次是纯国内投资,而国际循环的稳定性较差。从行业类别看,诱发结构 U 型变化的行业动因主要是在制造业部门。在国内循环逐渐主导的过程中,这些物质消耗部门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国内人力资本积累型服务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显现。

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国内循环带动作用占据主导是美国和中国长期增长绩效明显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国内大循环中,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明显,为美国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

相应的政策建议有三点。一是更加注重从动能角度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克服静态思维和存量视角的局限,坚决避免把国内循环占比高一点、国际循环占比低一点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效果评估的落脚点,国内国际循环占比是以我为主、市场决定、效益优先、兼顾安全的结果,短期的波动不能说明新发展格局的走向。必须坚持增长带动的衡量标准,从有益于稳定经济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的角度权衡国内国际循环关系。

二是更加注重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更深刻地认识“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的重要内涵,坚决摒弃自我隔绝、主动封闭等错误认识,中国应改变过去的一整套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逐步转向让城市化带动人力资本积累型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大循环政策体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消除市场分割、扩大中产规模、优化产业关联等结构性改革,提升市场规模、提振有效需求。

三是更加注重提升国内循环主导国际循环的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是要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不可能在国内全部消化,服务业产能也不可能在国内有全部需求,必须依靠国际大循环。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更充分地利用消费中心、生产基地、市场枢纽、创新高地等优势,对外部循环形成强大引力场,提升相机抉择的战略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 [1] 韩文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 2021-12-10.
- [2]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9-16.
- [3] 江小涓, 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1, (1):1-19.
- [4] 陈雨露.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J]. 中国金融, 2020, (1):19-21.
- [5] 余永定. 双循环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J]. 新金融, 2021, (1):6-10.
- [6] 张铭慎, 陆江源, 曹玉瑾. 中国经济双循环关系演进、质量提升与未来取向[J]. 全球化, 2022, (5):80-89, 134.
- [7] 黄群慧, 倪红福.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J]. 管理世界, 2021, (12):40-58.
- [8] 陈昌兵. 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再测算[J]. 经济纵横, 2021, (9):17-24.
- [9] 杨盼盼, 崔晓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 开放导报, 2021, (1):51-60.
- [10] 陆江源. 从价值创造角度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 当代经济管理, 2020, (12):8-15.
- [11] Johnson, R. C., G. Noguera.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224-236.
- [12]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459-94.
- [13] Wang Z, Wei S J,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 [14] 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 [15] 倪红福, 龚六堂, 夏杰长. 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J]. 管理世界, 2016, (4):10-23, 187.
- [16] 陆江源, 相伟, 谷宇辰. “双循环”理论综合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实践[J]. 财贸经济, 2022, (2):54-67.

- [17] 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39(3): 312 - 320.
- [18] 张军,施少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 - 1998[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 (2): 17 - 24.
- [19] 郭庆旺,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 *经济研究*, 2005, (6): 51 - 60.
- [20]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 2009, (1): 4 - 16.
- [21]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J]. *经济研究*, 2012, (11): 4 - 17, 75.
- [2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15, (11): 4 - 19.
- [23] 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J]. *经济研究*, 2018, (9): 4 - 19.
- [24]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9): 108 - 127, 205 - 206.

责任编辑、校对:张友双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XUE Cun¹, LU Jiang - yuan², ZHANG Ming - shen²

-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s a major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Using the value - added decomposition method,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data of OECD international input - output table (1995 - 2018), and synthesizes the WIOD (2000 - 2014) and ADB (2008 - 2020) international input - output data, and the WIOD historical input - output data (1965 - 2000) to decompose the added value crea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Further studies are mad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Three major conclusions are made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1965 to 2020,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ratio of China's GDP experienced a U - shaped change, which reduced gradually from more than 95%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o about 72% befo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n it steadily increased to 85% in recent years. Secondly, from 1996 to 2001,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ere 81.4% and 18.6%, respectively, from 2002 to 2008, the rates changed to 69.6% and 30.4%, and from 2010 to 2018, the rates further changed to 88.0% and 12.0%.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irdly, among the post -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strongest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making the performance of medium and long - term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other developed econom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ervices, real estat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have a more obvious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Growth Contribution; Development Momentum